



希望了解更多“新视界”报道内容,欢迎关注微信公共账号“新民锦读”。

新视界

本报焦点新闻部主编 | 第 68 期 | 2014 年 10 月 19 日 星期日 责编:程 绩 视觉:叶 聆 编辑邮箱: xmjdb@xmwb.com.cn

广场舞变奏



■市中心的广场空地,每天都能看见很多广场舞团队

本报记者 周馨 摄

全民起舞之势

“7 点到了,投资客与其盯着股评节目,不如去和大妈跳广场舞!”“为什么?”

“热衷广场舞的上海阿姨,既有钱又有闲,在家掌握财权,对家庭的投资走向有着绝对的话语权。”

这是近年在财经圈广泛流传的一个段子,虽是戏谈,却道出沪上广场舞的渗透程度,以及城市特色。

傍晚 6 时 30 分,伴随《小苹果》旋律响起,金平路上第一支广场舞队如约起舞。

南起东川路,北至剑川路,这条全长 1.5 公里的步行街,是老闵行的核心商业区,沿途店铺林立,热闹熙攘。夜幕降临,十余支广场舞队遍及街头巷尾,被唤作“三里跳舞街”。

流行歌、民族风、电子乐,从南到北舞风各异。相似的是,一只插上 U 盘的扩音器,就是全部装备。

47 岁的胡文卫是音响的持有人,也是团队的领舞者,这种模式在广场舞队很是常见。她所在的排舞队以凤庆路命名,成型较晚,规模却是最大,常年固定在 100 人左右。

不过,最近她无暇顾及“大部队”,而是挑选出 20 名“精兵强将”,紧锣密鼓备战 10 月下旬的比赛。从昨天闵行区“优值供杯”广场舞决赛,到接下来 2014 中信“幸福年华·舞动精彩”大赛,“凤庆排舞队”马不停蹄。

今秋,申城广场舞似乎比以往年更火一些。

作为上海市民文化节的项目,“幸福年华·舞动精彩”大赛在各区县共设有 24 个初赛点,45 场“海选”,近千支团队报名,预计参与人数超过 2 万。

全民起舞的时代,有多少支广场舞队?我们不得而知。随时随地,都可能有新生队伍诞生。不过,有一个数据却是共识,中国广场舞爱好者人数早已破亿。在舞友间,则流行着一句更通俗的说法——只要会走路,就能跳广场舞。

本报记者 范洁

或许,从没有哪种健身娱乐,像广场舞这样深陷爱恨两极。

拥有无可比拟的普及性与渗透力,同时却背负着难以调和的争议与矛盾。

何以强势崛起? 折射哪些变化? 怎样文明引导? 瓶颈能否破解? 一曲广场舞,浓缩了城市性格与时代特征,也考验着管理能力与社会价值。

群体归属之情

相比“凤庆排舞队”,“青花瓷舞队”通常到得稍晚一些。十余名成员,年纪也更集中在 50 岁上下。高校教师、国企高管的身份,却与公众印象中的“广场舞大妈”相去甚远。

2012 年,孙小芬因工作调动迁居闵行,从大学科研岗位转至行政管理,女儿也在同年赴美国求学,“时间突然多了出来,不太习惯”。

为熟悉环境,孙小芬散步至金平路,被此起彼伏的舞队感染,便藏身最后一排跟着“蹦跶”,谈不上热爱,权当是健身锻炼。

转变,出现在元宵节。那天,领队现场煮汤圆,舞友也带来瓜果,与其说是跳舞,更像是聚会。许是因为天寒地冻,那种久违的人情味让她格外感慨,“我们这代人普遍有着‘集体情结’,广场舞就像一种‘又找到组织’的亲切与激动。”

伴随出国留学的低龄化,中年夫妻提前进入空巢期;居住环境的私密性,也使人际交往愈发疏离。广场舞衍生的社交平台,却重构出城

市邻里间的“最佳距离”。

“舞友就像姐妹,互相关心照应。”孙小芬记得,听说丈夫犯起颈椎病,大家找名医、带颈托、备艾灸;赶上女儿赴美留学,这个买绒线,那个织毛衣,情意令她感动不已。

“上海阿姨”的热心,也借着广场舞向外辐射。一次,孙小芬偶然提起身边不少单身女教师,听者有心,没几天上海电气集团、西门子电器公司的舞友便介绍起小伙,广场舞成“牵线鹊桥”……

今夏,一名瑞典华侨经过金平路时极为震撼,强烈要求学习。“广场舞在海外更红,中国大妈席卷巴黎卢浮宫、纽约中央公园,不仅是对舞蹈的热爱,更多是对集体的留恋和对祖国的眷恋。”

青春未圆之梦

“你看,这是在虹口区比赛,我们得了一等奖!”还未落座,陈明已忙不迭递上手机,秀起广场舞队的演出视频与照片。

玫红色的上装,清爽的马尾辫,靓丽而活泼。“看不出吧,下个月我就 60 岁了!”从小热爱歌舞,向往登台表演,然而夙愿难偿。

陈明曾是一名劳教女警,不苟言笑的黑白灰构成工作主调;上世纪 90 年代,她辞去公职,为生计最忙时要打五份工,像陀螺转个不停,生活琐事将文艺梦掩上一层尘埃。直到邂逅广场舞,那些梦和记忆,重新苏醒。木兰拳、柔力球、踢踏舞,陈明全不错过,她将广场舞视作青春的“另一次绽放”,视作对错失生命色彩的加倍弥补。

家人支持,恰是广场舞的“上海特色”,“大妈开心,老公舒心,子女也省心。”

起初,并非没有微词。钟情广场舞,多少疏忽家事,与舞友冲突,也会将负面情绪带进家门。“明天起,你不要去跳舞了!”“不跳就不跳!”一次争执,丈夫给广场舞判了“死刑”。

然而,仅在家待了两天,她便熬

不住。“坐在沙发上,对着电视就哭了出来。”陈明有些意外,自己那么要强,竟在那一刻无比脆弱和委屈。“过去的几十年,我为工作忙碌、为子女操心,长期压抑和封闭兴趣爱好。现在生活闲了、孩子大了,我想改变,为自己活着!”

几番沟通,丈夫与孩子逐渐理解,主动分担家务。而在孙子出生的头两年,她也选择暂别广场舞,“互相体谅,寻找家庭与爱好平衡。”

最近“复出”,陈明的兴致更浓,梦想也更远。一次,在社区填写的“夕阳圆梦”明信片上,她如是写道:20 年后,我希望还能登台演出,孙子在台下为我鼓掌……

艺术追求之美

尽管“舞龄”不小,但听到还有个叫做“中国广场舞联合会”的民间组织,陈明依然有些意外。

她更没想到,协会副主席、“网络红人”宓子曾是金平路“跳舞街”的一员。

《自由行走的花》、《心之寻》,许多熟悉的舞步,均是出自宓子之手。“协会遍布全国 20 多个省市,每年网络上传 700 余套舞曲。没有专人创编,哪来那么多曲目?”宓子目睹并亲历广场舞的蓬勃,网络无疑是首要助推器。

2008 年北京奥运会、2010 年上海世博会,京沪两项大型盛事的举办促成全民健身意识的觉醒。那时,还没有“广场舞”的叫法,更多被称作“排舞”——排排队,跳跳舞,足见门槛之低、普及之快。

“其实,都不能算舞蹈,更像是广播操。”宓子回忆,一个八拍的动作,在四个方向循环重复,舞姿与歌曲脱节,提不上内涵和美感。身为高校教师的她凭借对艺术的热爱和学舞的基础,尝试结合歌词重新编排。

从朋友圈小范围流传,只有十几名粉丝,到被视频网站首页置顶,点击量突破千万,宓子坦言“走红纯属意外”,“这是广场舞的发展过程,

不仅满足基本的健身需求,而且对美感也有鉴赏要求。”

她最得意的作品,大抵是《草原的月亮》,被粉丝追捧为“全国跳得最多的一支广场舞”。舞蹈中,大雁指代草原,凝望寓意月亮,怀抱象征母亲,融入更多文学与美术元素。

在协会,宓子并不算“高产”,“我选曲很严,要走心,‘老公爱老婆’‘你是大灰狼’这些太过通俗的,绝对不碰。”自己的舞风受到青睐,她很欣慰,“都说广场舞扰民,如果窗户内飘进的是柔美清雅的笑声,或许是一件赏心乐事。”

噪音扰民之争

被爱之深,被责之切。

“泼水、扔垃圾、打 110……与其他舞队的争执,社会外界的抵制,都遇到过。”胡文卫和陈明有着相似感受。

无论身在城市的西南还是东北,广场舞者都处在漩涡中心。

在虹口区,鲁迅公园无疑是广场舞的“热土”,抢地盘时有发生,险些肢体冲突。即使成功“安营扎寨”,由于音乐节奏相互干扰,也经常闹起不快,“高音喇叭,你开得响,我比你开得更响,谁都不服气。”

迷上踢踏舞后,陈明面对的交锋更加激烈,“大头鞋、硬铁板,那多响啊,很不受欢迎,我们也就自觉不去了。”随后,她和舞友转战四川北路横浜桥,环境自然比不上公园,但也算找到一处“安身宝地”。

不过,投诉不期而至。选择的区域正对几幢商住两用楼,居民、酒店住户不堪其扰,持续向物业反映,“如果噪音不停,我们就退租”“再跳就喊警察”,舞队只好无奈收声。

她们的经历绝非个例,全国范围,广场舞诱发的矛盾更加急剧。温州业主购高音炮“以噪制噪”、北京男子放藏獒驱赶大妈,长春一小区在空地装满车位锁……想找一处适合跳舞的地方,为什么这么难?

(下转 A15 版)